

漢語詩律學研究的新材料與新問題 ——論唐代碑志銘詞韻式之新變

程 章 燦*

摘 要

任何韻文，皆因其韻脚之位置及用韻之頻率，而呈現為某種韻式。中國古代碑志銘文例用韻文，其韻式向未受人注意。自漢碑以來，日積月累，碑志銘文之韻式漸演而成一套固定程式，為魏晉南北朝作者所沿襲。至唐人繼之而作碑志銘文，在形式上多有新變，其尤值注意者，則為在韻式上打破漢魏六朝以來之程式，表現出多種獨特的、富於創意的新變。這些新變具有文學史背景和形式之淵源：就句式來看，這些新變韻式多與騷體句式有關；就時代來看，這些新變又多集中在中唐時代。本文通過對這些創新韻式的舉證與分析，指出碑志銘文韻式之研究應屬於詩律學研究課題之列；唐代碑志銘文韻式新變，不僅可以豐富並更新現有對於漢語古典詩律學尤其是韻律學的知識，也對深化碑志銘文和詩律學研究具有積極意義。

關鍵詞：唐代、碑志銘詞、韻式、新變

*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Journal of Humanities
Vol. 31, July 2007, pp. 37-64
College of Art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he Rhyme-scheme and its Innovation in the Rhyming *ming* of Tang Stele and Epitaph Texts

Zhangcan Cheng*

Abstract

The *ming* 銘 section in the stele and epitaph texts 碑志文 was generally written in rhymes, in other words, in a poetic form. However, from the Han to the Six dynasties, writers had developed some format of rhyme-scheme which became so popular that almost all scholars have ignored the existence of the innovation by their successors in the Tang dynasty.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various new rhyme-schemes invented in the Tang stele and epitaph texts and analyzes the poetic and literary significance.

Key words: Tang dynasty, innovation, rhyming *ming*, stele and epitaph texts

* Director, Institute of Chinese Classics, Nanjing University

壹、引論

古人寫作碑志銘文例用韻文，無論從其語言形式還是從其內容表現上看，這些銘文都可以看作是一種特殊形式的詩。在歷代碑志銘文中，年代最早的無疑是漢碑銘文。在寫作銘文之時，漢碑作者不僅明確稱其所作為「詩」、「歌」或者「頌」，從名義上確認其所作銘文為詩體，而且以其屬辭諧韻以及分章結構，從形式上再度確認其所作銘文為詩體。漢碑銘文不僅為後代碑志銘文樹立了一種創作典範，而且在漢語詩歌語言形式演進史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雖然這一點並沒有引起學術界廣泛的注意。¹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漢碑銘文亟待納入詩學的研究範圍，我們甚至可以將這些作品稱為「銘詩」²。但是，另一方面，在厚古崇漢的文化傳統之下，漢碑的這種典範作為一種程式，也對後代碑銘文以及由直接從碑銘文發展而來的墓志銘文的創作帶來了某種規範甚至約束，從而妨礙了碑志銘文藝術的進一步發展。魏晉南北朝碑志銘文恪守程式，缺少創新，在一定程度上便是這種規範和約束的表現和結果。

有唐一代，詩文發展都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碑志銘文創作，無論在結構形式上還是在內容表現上，都呈現出欣欣向榮的繁榮局面。由於人們對唐代文學的注意力絕大多數集中在詩歌方面，對於散文的關注，除了一些大家名家和少數名作之外，已經顯示出明顯的不足；至於唐代碑志

¹ 關於漢碑銘文的詩史意義，參看拙撰，“Poetry Inscribed on Stones: Prosody in Han Stele Inscriptions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Poetic Genres.” 未刊稿，曾在美國亞洲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2006年年會（2006年4月8日至10日，舊金山）上宣讀。

² 按：「銘詩」一詞，宋代學者趙明誠、洪适等已頗常用之，如趙明誠，《金石錄》卷十五〈漢東海相桓君海廟碑〉有「其銘詩有云」之句，見金文明，《金石錄校證》（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252；又如洪适，《隸釋》卷十七〈富春丞張君碑〉跋有「銘詩可讀」之句，見《隸釋》（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73。

文之創作，除了韓愈等極少數大家及其名作之外，更是鮮有問津者。具體到碑志銘文，儘管其在藝術形式上頗多創新，卻幾乎無人齒及。³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囿於狹隘的文學觀，對傳統碑志文之文學性認識嚴重不足；二是沒有充分注意到碑志銘文的形式美，更沒有將其作為富有詩意美和形式美的詩體來看待，這是令人遺憾的。

作為一個在傳統文體學中約定俗成的稱法，「碑志銘文」一詞容易引導人的思維確認其散文的屬性，而忽略其詩體的形式與意義。個人認為前文提到的「銘詩」一名可以使用，但考慮到此一概念目前尚不為學界同人所普遍熟悉，故決定採用「碑志銘詞」這個在文體界定上略帶中性的名稱。本文認為，作為一種特殊形式的詩體，歷代碑志銘詞不僅為漢語詩律學研究提供了很多富有價值的新材料，而且，通過對這些新材料的挖掘與剖析，還可以發現和探討一些關於漢語詩律學的新問題。限於篇幅，本文擬圍繞唐代碑志銘詞在韻式新變方面之表現，通過具體案例之分析，探討唐代碑志銘詞對韻式探索方面之貢獻，並試圖揭示其對中國詩體韻式革新之意義。

貳、唐前詩歌及碑志銘詞韻式之概況

所謂韻式，是指詩歌中由不同的韻腳位置安排而形成的形式特點。古人或稱為「用韻之法」，例如顧炎武曾將古詩用韻之法總結為三大類，雖然比較粗略，但顯然已經涉及到韻式的問題。⁴關於中國古代詩歌之韻式，今人朱光潛有較為詳細之論述如下：

³ 此類論文為數甚少，今舉以下二例：葉國良，〈韓愈冢墓碑志文與前人之異同及其對後世之影響〉，《石學叢探》（臺北：大安出版社，1989年），頁47-100；周敏，〈韓愈碑志的創革之功〉，《南京師範大學學報》期5（2000年），頁119-124。

⁴ 清·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樂保群、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全校本），卷21，「古詩用韻之法」條，頁1176。

從前中國詩人用韻的方法分古詩、律詩與詞曲三種。古詩用韻變化最多，尤其是《詩經》。江永在《古韻標準》裏統計《詩經》用韻的方法有數十種之多。例如連句韻（連韻從兩韻起一直到十二句止）、間句韻、一章一韻、一章易韻、隔韻、三句見韻、四句見韻、五句見韻、隔數句遙韻、隔章尾句遙韻、分應韻、交錯韻、疊句韻等等（江氏舉例甚多，可參考），其變化多端，有過于西文詩，漢魏古風用韻方法已漸窄狹，惟轉韻仍甚自由，平韻與仄韻仍可兼用。齊梁聲律風氣盛行以後，詩人逐漸向窄路上走，以至於隔句用韻，韻必平聲（注：律詩也偶有押仄韻者，但是例外）。一章一韻到底，成為律詩的定例。⁵

江永的統計及其分析，見其所撰《古韻標準》卷首〈詩韻舉例〉。雖然江氏分析稍嫌繁煩，某些舉例也有可能未必確當，⁶但我們必須承認，《詩經》中的韻式確實是多種多樣、富於變化的，與之相較，稍後的楚辭以及漢魏古詩的韻式便明顯簡單多了。約而言之，唐前各體詩歌甚至唐代近體詩，雖然形式有所不同，但在韻式方面卻表現出一種共同傾向，即韻腳的位置一般位於偶數句末，除了近體詩第一句（可押可不押）、古體詩轉韻句以及柏梁體詩之外，奇數句通常不押韻。⁷漢碑銘詞的韻腳位置一般亦在偶數句末，無論是其句式為四言、騷體抑或五言、七言，隔句用韻、偶數句末押韻的傳統韻式「一枝獨秀」，占據了主導地位。魏晉南北朝人受其影響，大多數碑志銘詞仍然沿襲漢代成規，層層相因，直到唐代，猶未衰減，其例甚夥，不勝枚舉。《詩經》中那些繁複多變的韻式，有如曇花一現，很快便被人遺忘了。

⁵ 朱光潛，《詩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166。

⁶ 例如對「三句見韻」到「五句見韻」的分析，以及對交錯韻的舉例，等等。見清·江永，《古韻標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四庫全書》影印文淵閣本），頁242、490-496。

⁷ 王力，《漢語詩律學》（增訂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54-74、375-393。

既然朱光潛將韻式多變的《詩經》與西文詩相比，我們不妨來看一看西洋詩歌韻式變化的大概情況。在敘述西洋詩歌韻式之前，爲了使韻腳標注便捷直觀，本文擬引入王力《漢語詩律學》中曾用過的西洋記韻法，「這種記韻法是用 a,b,c,d 等字母來表示的」，「字母相同，表示韻腳相同。例如一首詩有四行，它的韻腳是 abab，表示第一行和第三行押韻，第二行和第四行押韻」。⁸按王力《漢語詩律學》的總結，西洋詩以每段四行爲最常見；如果每段八行，往往可認爲兩個四行的結合。而四行的韻式大致可分爲三種：

- 一、第一行和第二行押韻，第三行和第四行押韻 (aabb) 叫做隨韻 (法文 rimes suives)；
- 二、第一行和第三行押韻，第二行和第四行押韻 (abab)，叫做交韻 (法文 rimes croisees)；
- 三、第一行和第四行押韻，第二行和第三行押韻 (abba)，叫做抱韻 (法文 rimes embrassees)。⁹

這三種韻式是主體，「其他各種韻式都可認爲這三種韻式的變相」。¹⁰王力將對這三種韻式的介紹，放在〈白話詩和歐化詩〉一章中，這容易使人覺得這些韻式主要見於漢語白話詩和歐化詩中。但事實上，這些韻式在《詩經》中曾經或多或少地出現過，而在《詩經》以外的其他漢語古典詩歌中罕見或不見應用的例子。

隨韻的韻式是句句押韻，每兩行(句)一換韻，與江永所謂「連句韻」尤其是其中的「連兩句韻」有些相似，與轉韻古風也有相似之處，但是，轉韻古風多數是四句或四句以上才轉韻，兩句即轉韻畢竟只是少數，而全篇都採用兩句即轉韻形式的更是少而又少。《文心雕龍》〈章句〉云：「陸

⁸ 王力，《漢語詩律學》(增訂本)，頁 917。

⁹ 王力，《漢語詩律學》(增訂本)，頁 920-921。

¹⁰ 王力，《漢語詩律學》(增訂本)，頁 920。

雲亦稱四言轉句，以四句為佳。觀彼制韻，志同枚賈，然兩韻輒易，則聲韻微躁。」在隔句用韻的情況下，兩韻即有四句，如此尚嫌聲調躁促，那麼，兩句即換韻自然更顯躁促。這或許可以解釋漢語古典詩歌中為什麼幾乎沒有通篇隨韻的作品。王力曾注意到，岑參〈輪臺歌〉已經非常接近隨韻中的一種——「每兩行一韻」的偶體詩 (couplet)¹¹：「它每兩句換一韻，而且平仄相間，但是到了篇末，還是不得不改用四句一韻，『因為不能一直促到底，必須衍為四句，以舒其氣。』」¹²

交韻亦即江永所謂「隔韻」，這種韻式在《詩經》中早已有之，江永和王力兩家已從《詩經》中找到了很多例子。¹³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這種在《詩經》中不算罕見的韻式，在《詩經》以後，至少直到唐代以前，在各體詩歌及碑志銘詞中卻難以再見到蹤影。需要強調說明的是，這裏指的是交韻的正則，亦即雙交 (abab)，而不是其變例亦即單交——偶行押韻而奇行不押韻 (abcb) 那種形式。實際上，單交韻式在漢語古典詩歌中最為常見，首句不入韻的絕句和律詩便都屬於這種韻式。不少首句不入韻的古詩和碑志銘詞也屬於這種韻式。

與隨韻、交韻相比，「抱韻是純然西洋的形式」，「中國詩人，除了近年的商籟作家之外，用抱韻的很少。」¹⁴在《詩經》中，只有〈周頌·思文〉、〈大雅·大明〉、〈小雅·車攻〉三篇中各有四句符合嚴格的抱韻標準，因此可以說，「抱韻在《詩經》中少見」。¹⁵

¹¹ 王力，《漢語詩律學》(增訂本)，頁 923。

¹² 王力，《漢語詩律學》(增訂本)，頁 365。

¹³ 江永說見其《古韻標準》，王力說見《漢語詩律學》，頁 1010-1015，又見王力，《詩經韻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 70-75。《詩經韻讀》將《詩經》中的交韻分為純交韻和複交韻兩種，其所謂「純交韻」相當於《漢語詩律學》所謂「交韻」，所舉例證有所不同。王力在這兩本書中所舉交韻例子，與江永書亦有出入。

¹⁴ 王力，《漢語詩律學》(增訂本)，頁 929、930。

¹⁵ 王力，《詩經韻讀》，頁 75。

在上述這三種正體韻式之外，還有一些雜體韻式，如遙韻。「凡不止隔開兩句押韻的，叫做遙韻。有時候，是每段的末句互相押韻。」如果以英文字母表示其韻式，則是abcd efgd……。「現代漢語歐化詩裏，似乎很少有用遙韻的，我們還沒有看見過，因此無可舉例。」¹⁶而在古典詩歌中，至少在《詩經》中，卻早已經使用遙韻這種韻式，「一般是在詩章的末尾，而且是同樣的句子」。¹⁷江永《古韻標準》中所標舉的《詩經》「隔數句遙韻」、「隔章尾句遙韻」二例，即屬遙韻之式。讓我們同樣感到遺憾並納悶的是，《詩經》以後，唐前各體詩歌中也未見採用這種韻式者。

遙韻之外，西洋詩歌雜體韻式中還有由兩種或兩種以上韻式混合使用而形成的諸種形式，諸如交隨相雜、交抱相雜、隨抱相雜、交隨抱相雜等等，有的在白話詩或歐化詩中有較多或少數詩人仿用，有的則無，在古典詩體中，則基本中未見其例。

但是，如果我們將唐代碑志銘詞方面的材料納入漢語詩律學範疇，我們的視野中便會出現一幅新的漢語詩律史圖景。至少從初唐開始，就有不少碑志文作家開始窮極思變，致力於韻式的創造與革新，並創作了相當一批在韻式上獨具匠心的碑志銘詞，其形式變化多端，不僅可以與前代的《詩經》相提並論，有過之而無不及，亦可與西洋詩歌爭奇鬥妍。從總體來看，唐代作家在碑志銘詞韻式方面的新變可謂層出不窮，但是，他們的獨特貢獻並沒有引起詩律學者的注意，更沒有受到文學史家的重視。實際上，在這些向來被忽略的歷史材料背後，也存在尚待開掘的若干有關漢語詩律學的新問題。

¹⁶ 王力，《漢語詩律學》（增訂本），頁931、932。

¹⁷ 王力，《詩經韻讀》，頁90。

參、唐代碑志銘詞韻式舉例及分析

清梁玉繩（1745-1819）《志銘廣例》卷一「銘詞異格」條云：

〈郭忠武王家廟碑〉，顏魯公撰，並書銘詞八章。每章四言五句，上四句，虞、陽、皓、東、置、陽、嘯、支，各間用韻；末一句合八章同用侵韻。此格前所未有。¹⁸

梁玉繩指的是載於《文苑英華》卷八百八十的顏真卿（709-785）〈郭子儀家廟碑〉，其銘詞如下（加粗者為諧韻之字，下同）：

郭之皇祖，肇之號土，逮乎後昆，實守左輔。徙華陰兮；
源長流光，施于司倉，涼州兵部，克熾而昌。載德深兮；
篤生太保，允懋厥道，神之聽之，永錫難老。式如金兮；
於穆令公，汾陽啓封，文經武緯，訓徒徬空。簡帝心兮；
含一不二，格於天地，愷悌君子，邦之攸暨。昭德音兮；
芝馥蘭芳，羽儀公堂，子子孫孫，為龍為光。鏘璆琳兮；
乃立新廟，肅雍允邵，神保是聽，孝思孔昭。亶居歆兮；
乃立高碑，盛德美敘，日月有既，徽猷永垂。映來今兮。¹⁹

這篇銘詞每章五句，第一、二、四句相互諧韻，而第五句則與另外七章的第五句諧韻，也就是說，前四句在押韻上自成一體，第五句另為一體。這樣，章與章之間、章內各句之間，形成了一種既有分別、又有趨同的特殊聯繫。通過巧妙的韻式安排，顏真卿成功地創造了一種獨特的韻式結構。顯然，梁玉繩已經注意到其形式的與眾不同，故嘆為「銘詞異格」，「前所

¹⁸ 清·梁玉繩，《志銘廣例》（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叢書集成初編》本），頁20。

¹⁹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卷880，頁4642。

未有」，葉國良先生也稱此式「足廣異聞」。²⁰ 筆者贊同梁、葉二家的看法，但更想進一步指出，諸如此類的「銘詞異格」在唐代碑志文中並不罕見。

差不多與〈郭子儀家廟碑〉同時，在唐代宗永泰（765-766）年間，就有一篇碑文銘詞的韻式與此相同，只不過用韻略疏，而換韻較頻而已。這就是豆盧誥（765-766 前後在世）〈嶺南節度判官宗公神道碑〉：

於穆君子，問望不已。文武並茂，忠孝兼美。德所立兮。
奕奕韓邑，嗷嗷疲人。命公為宰，厥政維新。化所及兮。
小臣不帥，肆虐荒裔。師徒不勤，渠魁自殪。資令謀兮。
聖朝懋賞，俾崇乃秩。卿月照庭，堂霜輝質。沐鴻休兮。
天地不仁，殲我邦彥。百身莫贖，孰不興怨。行之積兮。
孀妻孤女，魂斷骨驚。爰紀貞石，永播芳名。美無斁兮。²¹

第一、三章的韻式與〈郭子儀家廟碑〉完全相同；其他各章第一句不押韻，與〈郭子儀家廟碑〉略有不同。章末句押韻，但每兩章即換韻，與〈郭子儀家廟碑〉之一韻到底亦有不同，但總的來看，章末句兩韻之間皆相隔三句以上，屬於遙韻。從整體來看，這兩篇銘詞的韻式應該說屬於同一類，即單交與遙韻相雜式。

五句一章的銘詞之外，再請看四句一章的銘詞。〈大唐故朝請大夫尚書司勳郎中吉公墓志銘〉（以下簡稱〈吉渾墓志銘〉）云：

維岳吐符，降先大夫，匡周道乎，本枝喬兮；
靈氣不絕，世載丕烈，三葉鍾絕，懿羨昭兮；
堂堂司勳，揚光騰芬，顯允令聞，厲高颯兮；
錦製唯明，馥奏作程，開物有成，灼天朝兮；

²⁰ 葉國良，〈石例著述評議〉，《石學蠡探》，頁 115。

²¹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 927，頁 4883。

才唯經濟，雅心未契，倏邁大戾，忽若飄兮；
大河之湄，崢嶸古馘，次□相之園祠，松蕭蕭兮；
□嗟大夫，垂昭業於永永，錮幽夜於遙遙兮。²²

這篇銘詞共七章，每章四句，除了第七章之外，其餘六章皆遵循同一韻式，即：在各章之內，前三句句句押韻，末句則與其他章末句押韻。這篇銘詞與〈郭子儀家廟碑〉同樣通篇採用四言句式，末句同樣以「兮」字收尾，韻字同樣在「兮」之上，但仔細比較，仍可看出諸點同中之異：全篇章數不同；章下句數不同；章中韻數亦復不同。在〈郭子儀家廟碑〉，每章末句與相隔四句的另一章末句押韻；而在〈吉渾墓志銘〉中，每章末句與相隔三句（最後一章末句與倒數第二章末句之間只隔開兩句）的另一章末句押韻。如果用字母來表示，則〈郭子儀家廟碑〉銘詞之韻式為 aabac, ddedc……，每章頭兩韻與第三韻之間相隔一句；〈吉渾墓志銘〉銘詞前六章之韻式為 aaab, cccb,……每章頭兩韻與第三韻之間沒有間隔（好像刪去了〈郭子儀家廟碑〉銘詞中不押韻的第三句），屬於隨韻中的三隨式（aaa,ccc……）。這兩篇銘詞的韻式，用江永的術語來說，屬於「隔章尾句遙韻」；用《漢語詩律學》自西方詩律學引進的術語來說，此種韻式稱為遙韻。而〈吉渾墓志銘〉銘詞則是隨韻（三隨式）與遙韻雜用，可以稱為隨遙相雜式。

無獨有偶。〈吉渾墓志銘〉銘詞之韻式亦見於權德輿（758-815）〈溫州刺史裴希先碑〉之銘詞：

河東右族，蕃衍紹續，代功世祿，昌而熾兮。
乃生永嘉，剖符承家，實而不華，論於義兮。
二邦靜謐，禮之善物，朱轡赤葦，亦為貴兮。
有齊永年，作儷仁賢，佩玉槍然，四德備兮。

²²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志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1149。

天漢之尊，平王之孫，爛其盈門，恭祀事兮。
返彼玄壤，少陵之上，終古悽愴，金石識兮。²³

一碑一志，異曲同工，足見此種韻式頗為權德輿所重視。

權德輿甚至有點偏愛這種韻式，其〈嶺南節度使徐申墓志〉之銘詞，可以看作是這種韻式的變體。其詞云：

噫徐公！

有質有文，有義有仁。名聲章明，邁群倫兮。

噫徐公！

不忤不求，不緇不磷。贊佐四征，暢嘉聞兮。

公之牧人，

于韶于景，于邕于廣，朱轡照路，利攸往兮。

公之愛人，

以清以靜，以惠以養，流庸集附，如景響兮。

如何不備，奄忽鞠凶，蒼龜之同，天地之中。

籲嗟乎徐公！²⁴

這篇銘詞前四章開頭都有一個領起句，其結構功能類似疊句，故筆者將其單列，餘下每四行為一章。頭兩章之韻式為 abcd,ebcd 八行之內，三韻交叉；三四兩章之韻式為 abcd,abcd 八行之內，四韻交叉；總之，這兩者都是比較繁雜的交韻形式。第五章則是句句押韻，為四句隨韻式。

唐代碑志銘詞中有不少是以三句一章的，其韻式也有多種變化。同樣在權德輿的作品中，就有〈尚書左僕射宣武軍節度使董晉神道碑〉（以下簡稱〈董晉神道碑〉）一篇，其銘詞云：

²³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 924，頁 4868。

²⁴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 939，頁 4938。

後王財成，雋乂昭明，以建皇極。
甫申居內，方邵理外，周邦是式。
於惟隴西，求福不回，文武宣力。
調和公餗，整訓長轂，柔惠且直。
膠西章章，道可佐王，屈相下國。
綿代儲慶，至公而盛，位實配德。
子子幹旟，昔往浚都，俗旣紓息。
翻翻素旗，今旋洛師，人用悽惻。
惟是壤樹，資於四布，萬安之側。
德輝在茲，末代有詞，於以篆刻。²⁵

這篇銘詞共十章，每章三句，前兩句押韻，第三句即末句則與其他章末句相諧，其韻式爲 aab,ccb,ddb,eeb……，隨韻和遙韻相雜，亦即隨遙相雜式。除了《詩經》以外，這種韻式不見於唐前各體詩歌中。

出人意料的是，在碑志文中，這種韻式並不罕見。先於權德輿數十年，初唐時代的張九齡（678-740）在其〈河南少尹竇府君碑〉之銘詞中已經使用了這種韻式：

綿綿瓜瓞，少康遺烈。靈則長兮。
莫莫葛藟，王孫承祀，世其昌兮。
而我實績，如金如玉，載錫光兮。
咨亞尹之德，柔嘉維則，惟令問兮。
惟別駕之功，邦國不空，毗胥詠兮。
不競不綽，不剛不柔，以成政兮。
德之攸好，神之所勞，實降祥兮。
有美無度，曷不胤祚，今則亡兮。

²⁵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 886，頁 4671。

我著名節，俾無泯滅，惠無疆兮。²⁶

這篇銘詞共九章，每章三句，其韻式為 aab,ccb,ddb……，與〈董晉神道碑〉正相同。而在墓志文中，至遲在盛唐開元時代的〈大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贈荊州大都督清河郡開國公上柱國崔公墓志銘并序〉以及〈唐故左衛伊川府長史太原王府君墓志銘并序〉的銘詞中，也已經使用這種韻式了，²⁷中唐古文家梁肅（753-793）〈鄭州原武縣丞崔君夫人源氏墓志銘〉之銘詞亦使用這種韻式。²⁸最值得注意的是，權德輿不僅在〈董晉神道碑〉中使用這種韻式，而且在〈朝散大夫容州刺史戴公墓志銘〉²⁹、〈崔相國夫人柳氏墓志〉³⁰、〈權員外自挹墓志〉（後三章）³¹等篇的銘詞中多次使用這種韻式，都是每句四言，三句一章，惟有一點與其他唐代作家不同，即權氏所撰這種韻式的銘詞每章末句都不以「兮」字收尾。這不僅說明，權德輿對此種韻式情有獨鍾，並有獨創，而且說明這種韻式在唐代碑志銘詞中確實是比較普遍存在的。

以上所舉隨遙相雜式諸例，實際上可以分作兩種類型，一種是每章末句押韻並且一韻到底，終篇不換韻，如〈董晉神道碑〉；另一種則章末韻腳有變，如〈河南少尹竇府君碑〉，又如梁肅〈給事中劉公墓志〉之銘詞：

惟堯之緒，在漢開楚，導長源兮。

比部蘊仁，文公允文，闢儒門兮。

重世掌史，遷固慙美，立斯言兮。

²⁶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 918，頁 4834。

²⁷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志彙編》，頁 1277、1394。

²⁸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 966，頁 5078。

²⁹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 952，頁 5006。按：在此篇銘詞中，第二章頭兩韻不押韻，不合前後章之韻式，疑有誤字，然檢《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卷 502，頁 2265-2266 所載銘詞，並無異文。存疑待考。

³⁰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 967，頁 5085。

³¹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 941，頁 4951。

惟公才明，剛中志行，直道發兮。
累佐使臣，一麾牧人，遺愛結兮。
給事於中，遭命不融，神理忽兮。
丘有夷，淵有實，舟斯失，劍斯沒，石不滅兮。³²

這篇銘詞一共七章，前六章韻式為 aab ccb ddb eef ggf hhf，亦屬隨遙相雜的韻式。隨著第四章章末句韻的變換，這六章截然分為前三章與後三章兩大段落。其共同點是每句四言，每三句為一章，第三句以「兮」，以「兮」字前面一字為韻腳，與相鄰章同一位置上的那個字相諧，韻式相當整齊。而第七章大體為三言，後四句句句押韻，自為一體。

張說（667-730）〈贈廣州大都督馮府君神道碑〉之銘詞云：

明珠紫貝，產於南國，代所珍兮。
允矣君子，不耀其德，克全真兮。
慶流我後，高驤上肅，中貴臣兮。
朱幡象服，寵及泉路，榮其親兮。
孝道不隕，勒銘表墓，留芳塵兮。³³

其韻式為 abc dbc efc gfc hfc，即每章後兩句與相鄰章後兩句分別諧韻，如果忽略每章第一句，那麼，這種韻式可以看作是跨章交韻式。從張說此碑之例可以看出，這種韻式至少在初唐已經出現，至盛唐開元時代，有〈大唐故左羽林軍長上果毅都尉董公志石文并序〉，其銘詞共六章，亦用此種韻式。³⁴中唐時代，獨孤及〈贈太常卿韋績碑〉前四章銘詞云：

肅肅乃祖，翼商屏周，摠郡邦兮。
退傳間生，扶陽重侯，德功降兮。

³²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 944，頁 4967。

³³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 913，頁 4808。

³⁴ 詳見周紹良主編，《唐代墓志彙編》，頁 1263。

龜組虎符，黼衣彤弓，世相付兮。
百代純嘏，鍾仁於公，德乃懋兮。

其銘詞前四章韻式爲 abc dbc efg hfg，亦與〈贈廣州大都督馮府君神道碑〉銘詞韻式相同。柳宗元〈亡妻弘農楊氏墓志〉銘詞云：

坤德柔順，婦道肅雍，惟若人兮。
婉婉淑姿，鏘翔令容，委窮塵兮。
佳城鬱鬱，閉白日兮，之死同穴，歸此室兮。³⁵

其前兩章亦是 abc dbc 的韻式，後一章則是四句隨韻。將全篇合起來看，其韻式屬於交韻和隨韻雜用，亦即交隨雜用式。

〈贈太常卿韋鎮碑〉後六章銘詞云：

為邦三年，足民知方，政之臧兮。
校文石渠，觀書魯堂，志自強兮。
三佐列郡，曳裾游梁，道未光兮。
已矣介福，不充景行，於嗟命兮。
一經之遺，垂裕果盛，哀榮並兮。
子子孫孫，丕承忠敬，荷餘慶兮。³⁶

其韻式爲 abb cbb dbb eff gff hff，也就是說每章第一句不押韻，後兩句則自相諧韻，屬於章內隨韻式。這種韻式亦見於梁肅〈權秘監公夫人李氏墓志〉：

武昭之胄，立德立功，且侯且公。
文穆之後，昭明有融，繼別為宗。

³⁵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 968，頁 5092。

³⁶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 899，頁 4736。

抑抑夫人，餘慶是**聚**，溫良在**躬**。
歸我秘書，體仁協**哀**，盛德攸**同**。
乃訓孟子，擇乎中**庸**，休有先**風**。
豈命有極，豈天不**備**，降此鞠**凶**。
假窆何所，惟柏惟**松**，于江之**東**。
棘人充**充**，式號且**恫**，哀思無**窮**。³⁷

這篇銘詞共八章，每章後兩句押韻，第一句不押韻，³⁸與〈贈太常卿韋績碑〉銘詞後六章相同；但是一韻到底，又與〈贈太常卿韋績碑〉相異。其韻式為 *abb abb cbb dbb ebb fbb gbb hbb*。

〈唐故方律師像塔之銘〉銘詞韻式正好與此相反：

大士攝**生**，不貪代**榮**，豎法幢**兮**；
諷詠葉**典**，玄章要**闡**，墮邪教**兮**；
增善法**戒**，累郭腐**敗**，摧苦輪**兮**；
生必歸**滅**，悲哉傷**哲**，懷哀哉**兮**；
建塔山**陽**，刊石傳**芳**，□□□**兮**。³⁹

其韻式為 *aab ccd*……，亦即每章頭兩句自相押韻，而後一句則不押韻，雖然同為章內隨韻式，而表現形式卻有所不同。

如前所述，偶體詩是隨韻中的一種，每兩行一韻，在漢語古典詩歌中頗為罕見。而白居易〈賢妃京兆韋氏墓志銘〉之銘詞就是一篇「偶體詩」：

³⁷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 966，頁 5077。

³⁸ 按：頭兩章韻式可以標注為 *abb abb*，與其他各章不盡相同，也可能是偶然暗合，未必有意為之。

³⁹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志彙編》，頁 1331。

京兆阡兮，洪平原兮。
歲己醜兮，日丁酉兮。
惟土田兮與時日，龜兮著兮偕言吉。
峩峩新墳兮葬者誰，德宗皇帝韋賢妃。⁴⁰

其韻式為 aa bb cc dd，雖然句數較少，但其偶體形式顯然較前文所提到的岑參〈輪臺歌〉更為純粹。

《毛詩正義》〈周南·關雎〉孔穎達疏云：「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耳。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為辭，雖在句中，不以為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為韻。」⁴¹然人志各異，作詩不同，必須聲韻諧和，曲應金石，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之體者。⁴²以上所舉各例中，以「兮」字結尾（「處末」）的句子，「皆字上為韻」。下面再舉一個以「之」結尾而「字上為韻」的句子。張說〈常州刺史平貞眷神道碑〉銘詞有云：

高明徇美，學以潤之。
官方正事，靜以鎮之。
嚴嚴憲府，公三峻之。
赫赫儲宮，公三訓之。⁴²

應該說明的是，這八句只是全篇銘詞的一部分，其餘各句並不包含虛字，故韻字皆在句末，這八句因此顯得卓異不群。常兗（729-783）〈太子賓客盧盧君墓志銘〉之銘詞則屬於「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之體者」。其詞云：

五侯九伯，太公征之。

⁴⁰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 969，頁 5095。

⁴¹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 1，頁 6 中；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79 年），頁 274 下。

⁴²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 921，頁 4852。

大輅龍旂，桓公受之。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前人光明，我公昭之。
天子作師，我公師之。
懿德顯猷，永世則之。⁴³

每句皆以「之」字爲韻。這兩種韻式，無論是否以句末虛字爲韻，皆已見於《詩經》，因而不能算是唐代作家的獨創。但是，在漢魏六朝碑志銘詞中，這兩種韻式極爲罕見，而在唐人的創作中則較爲多見，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個現象。

從韻式上看，張說〈淄州司馬鄭府君神道碑〉之銘詞也有特色：

大君有命，桓公封鄭，世執王政，其後不競。為韓所并，以國成姓。
沈水截河，溢為滎波，荆山之阿，勝氣實多。高門峨峨，袞服委他。
猗嗟君子，世濟其美，動如義市，居成仁里。鳳集文忠，猿啼弧矢。
善政當官，惟人所安。救危拯越，勞而不伐，大運奄忽，芳留形沒。
高壠既封，深泉又重，徑無人蹤，薺苔歲濃。哀哀丘隴，墮淚青松。⁴⁴

這篇銘詞三十句，可分爲五章，每章六句。除了第三章第五句「鳳集文忠」沒有押韻、第四章內部有換韻，其他各章六句皆一韻到底，基本上屬於句句押韻。除此之外，唐代碑志銘詞中還有柏梁體即七言句句押韻式，如元載〈蕭郎中存墓志〉：

崇山鬱鬱連西岡。青龍白虎為壽堂。靈其少安樂且康。旄頭不明歸
舊鄉。⁴⁵

⁴³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 942，頁 4955。

⁴⁴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 926，頁 4878。

⁴⁵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 941，頁 4949。

梁肅〈李中丞史魚墓志〉亦可以認為是柏梁體之變形，其銘詞云：

時之晏，卿雲爛，鸞鳳於飛上清漢，吾道行年路方半。
時之昏，沴氣繁，鯨鯢蕩海橫中原，側身西望不敢言。
忠莫渝兮計獨存，奮辭感激牧東藩，雷雨作鮮草木蕃。
一隨逝水空遊魂，播清徽與茂烈，永延輝兮垂後昆。⁴⁶

這篇銘詞中含有四句三言，第四句起換韻，倒數第二句不押韻，總之，它的韻式可以視為柏梁體的變形。

長篇碑志銘詞往往分成若干章，每章換韻，這是從漢碑開始形成的傳統習慣，一韻到底的畢竟是少數。因此，馮宿〈魏府狄梁公祠堂碑〉之銘詞顯得頗為另類、稀罕。這篇銘詞長達 648 字，四言一句，共 162 句，而從頭到尾只押一韻，始終不變，⁴⁷不僅在唐代碑志銘詞中不多見，在整個碑志銘詞發展史上也顯得頗為特殊。就換韻來說，漢魏晉南北朝碑志銘詞一般比較隨意。總的來看，這一時期碑志銘詞長達三章以上的並不少見，但在轉韻時能夠作到有規律地平仄相間的卻相當稀罕。眾所周知，漢語四聲之分辨始於南朝永明時代，但南朝人將四聲分作平上去入四類，而不是平仄二元，因此，南北朝銘詞轉韻時不可能有追求平仄相間的自覺意識。隋〈李靜訓墓志〉銘詞共四章，用韻依次為平、仄、平、仄，平仄相間，這是難得一見的例子，⁴⁸或許出於妙手偶得，而非用心經營所成。而在《唐文粹》卷六十一中，我們看到梁肅〈天臺智者大師碑銘〉，依次押去平入三韻，轉韻順序為仄、平、仄，⁴⁹正是平仄相間。更突出的一個例子是丘

⁴⁶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 944，頁 4966。按：「雷雨作鮮」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鮮」作「解」。《易》〈解〉云：「雷雨作解。」則「鮮」當作「解」，蓋形近而訛。參看唐·梁肅著，胡大浚、張春雯整理校點，《梁肅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143。

⁴⁷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 877，頁 4627-4628。

⁴⁸ 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志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頁 547。

⁴⁹ 宋·姚鉉編，《唐文粹》，（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四庫全書》影印文淵閣本），

降（785-820 前後在世）〈常山郡王田緒神道碑〉，其銘詞共十二章，每章六句，平仄相間。⁵⁰如此有規律的平仄相間的換韻，顯然是作者經心安排的。

當然，也有一些作者在換韻時故意打破整齊與均衡，追求不規則的參差，例如韓愈（768-824）〈柳州羅池廟碑〉銘詞：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
侯之船兮兩旗，渡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
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嘖以笑。
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
侯朝遊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
福我兮壽我，驅癘鬼兮山之左。
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羨兮蛇蛟結蟠。
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世。⁵¹

顯然，這種轉韻形式也會給我們一種別出心裁、耳目一新的感覺。

肆、小結

唐代碑志銘詞韻式之革新，代表了唐代作家在詩體或韻文語言形式方面的一種積極探索，其所表現出來的各種形態，不僅是漢語詩律學研究中不可忽視的新材料，而且引導我們探討其背景及原因，促使我們進一步追

冊 1344，頁 1-3。

⁵⁰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 891，頁 4691-4692。按：丘降，《全唐文》，卷 615，頁 2754 作丘絳，《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66 年），卷 448 作丘絳，似當作丘絳。

⁵¹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 876，頁 4623。

索其中的意義。

從上文所舉例證中可以看出，那些在銘詞創作中追求韻式新變的唐代作家，大體上也就是在當時碑志文創作中負有盛名的高手，如張說、權德輿、梁肅、獨孤及、韓愈、常袞等人。以時代的坐標來看，銘詞韻式之新變大量出現在中唐時代，這與中唐時代詩文體的革新是基本一致的。就權德輿、梁肅、獨孤及、韓愈等人而言，他們在碑志銘詞韻式方面的革新，正是中唐詩文體革新的重要一翼。唐代碑志銘詞中的很多韻式，與西洋詩歌韻式相近、相通或相同，它的繁複多變，不僅突破了前代詩律學和碑志銘詞創作的種種成規，而且改變了我們對漢語古典詩體及韻文格律的認識，具有重要的認識價值和文學史意義。

從上文所舉例證中也可以看出，革新韻式的銘詞在形式上體現出顯著的特點，那就是句式基本上為四言，其中又較多以「兮」字結尾的句子。四言句式來自《詩經》，而「兮」字結尾的句子則源出《詩經》和《楚辭》。在銘詞中，「兮」字句一般都在每章末句，無論其一章的長度是兩句、三句，還是多達四句、五句。單純從外形上看，兩句一章式與〈橘頌〉句式相近：「后皇嘉樹，橘徠服兮。」三句一章式，則始見於西漢王褒〈洞簫賦〉中的亂辭：

狀若捷武，超騰踰曳，迅漂巧兮。
又似流波，泡洩汎濺，趨巖道兮。
哮呷呖喚，躋躡連絕，漏殄沌兮。
攪搜淖捎，逍遙踴躍，若壞頽兮。
優遊流離，躊躇稽詣，亦足耽兮。
頽唐遂往，長辭遠逝，漂不還兮。
賴蒙聖化，從容中道，樂不淫兮。
條暢洞達，中節操兮，
終詩卒曲，尚餘音兮。

吟氣遺響，聯絲漂撇，生微風兮。

連延駱駢，變無窮兮。⁵²

這篇亂辭無疑是一首騷體詩，但其韻式卻頗為新奇，令人矚目。在前六行中，每兩行（六句）為一個單位，遵循同一韻式（abc dbc），即第二句與第五句押韻，第三句與第六句押韻，是一種特殊形式的交韻，即跨章交韻。相對而言，後五行的韻式（abc ab dc efg fg）不那麼整齊，但仍然可以確認其基本上屬於跨章交韻形式。另外一個頗可注意的例子是東漢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之亂辭：

彤彤靈宮，巋靠穹崇，紛厖鴻兮。

崩崩嶷嶷，岑峯嶙嶙，駢巖嵒兮。

連拳偃蹇，嶮困蹇蹇，傍欹傾兮。

歇歎幽藹，雲覆霏霏，洞杳冥兮。

蔥翠紫蔚，礪礪瑰璋，含光晷兮。

窮竒極妙，棟宇已來，未之有兮。

神之營之，瑞我漢室，永不朽兮。⁵³

這篇亂辭前四章的韻式為aaa bba ccd eed，屬於隨遙相雜式，與前文所析梁肅〈給事中劉公墓志〉之銘詞相似，惟章末之句，王賦兩章一換韻，而梁志三章一換韻。王賦後兩章末句相互押韻，其韻式為abc dec，與前四章顯然不同。

從以上兩篇賦末亂辭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來，在漢代的韻文作品中曾經有過這樣一種格式：以三句為一章或一節，並使用跨章交韻或隨遙相雜的韻式。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除了賦末亂辭之外，在唐以前其他楚辭作品或騷體句段中，我們基本上沒有看到過這種句式和韻式，直到唐代，這種句

⁵²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17，頁246下。

⁵³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11，頁172上。

式和韻式才在碑志銘文中重新出現。很明顯，〈洞簫賦〉和〈魯靈光殿賦〉篇末的亂辭採用的是楚辭的形式，受到了楚辭的影響，但另一方面，其韻式結構在楚辭的基礎上又有創新，而這種創新的韻式結構又影響了後來的唐代碑志銘詞。雖然賦是韻文，傳統看法又認為它是「古詩之流」，但從賦的文章主體來看，它並沒有形成一種較為固定的韻式，對漢語詩律學的韻式並無特殊的貢獻。應該另眼相待的只有賦的篇末亂辭。無論就其在篇中位置來說，還是就其結構功能來看，賦末亂辭皆與碑志銘文頗多相同之處，皆應視為漢語詩律學研究的新材料，納入我們的研究範疇。這是唐代碑志銘詞在形式上遙承二賦亂辭的一個原因。

正如前引江永《古韻標準》所指示的，《詩經》中的韻式明顯比後來的漢魏六朝古詩和唐代近體詩複雜多樣。《詩經》「用韻變動不居」⁵⁴，形式多樣，在很大程度上與其所具有的樂歌性質相關。換句話說，《詩經》中的很多句式和韻式之運用，是為配合當時的樂歌曲調及其演奏，例如江永所標舉的分應韻、交錯韻、隔數句遙韻以及隔章尾句遙韻等韻式，便可以看出其與樂調及其演奏之關係。⁵⁵在碑志文中，銘詞無疑也是其中最富音樂成份、最宜於吟唱吟讀的部分，某些漢碑中更逕稱銘詞為「歌」。⁵⁶雖然這些銘詞並不配合某一確定的曲調，但是，即使在今天，我們只要仔細分析其句式與韻式結構，便能看到其中包含有如同音樂演唱中不同聲部配合的那樣一種結構形式。梁肅〈鄭州原武縣丞崔君夫人源氏墓志銘〉之銘詞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這篇銘詞共四章，每章三句，頭兩句自相押韻，後一句與鄰章末句相諧（隔章尾句遙韻），其韻式為 aab ccb ddb eeb。為了突出其結構特點，便於更直觀地說明問題，我在抄錄這篇銘詞時，將其

⁵⁴ 清·江永，〈詩韻舉例〉，《古韻標準》，卷首，頁490。

⁵⁵ 關於《詩經》韻式與表演的關係，《詩經》學者早有論及，參看 Kern Martin, "Shi Jing Songs as Performance Texts: A Case Study of 'Chu Ci' (Thorny Caltrop)," *Early China*, no. 25 (2000): 49-111.

⁵⁶ 如〈張公神碑〉稱「作歌九章」，〈先生郭輔碑〉稱「鐫石作歌」，分別見宋·洪适，《隸釋》（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3，頁42；卷12，頁142。

排列方式略作調整如下：

烈烈雄闊，降茲淑哲，
惟夫人兮。
鬱鬱母儀，中外肅祗，
耀閨門兮。
以道自光，我性則常，
奄歸貞兮。
孝乎維嗣，其哀也至，
刻斯文兮。

這樣，各章頭兩句組成第一個聲部，兩句一換韻，而末句則成爲第二個聲部，一韻到底，全篇用韻同中有異，既有變化又有連續性。其結構與《詩經》〈周南·麟之趾〉如出一轍：

麟之趾，振振公子。
於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
於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
於嗟麟兮！⁵⁷

章末三句「於嗟麟兮」具有文本和音樂的雙重結構功能，既互相押韻，構成遙韻；也前後呼應，構成疊句。前文所舉唐代碑志銘詞的各種韻式，基本上都具有這樣一種文本結構和音樂結構的雙重結構功能，其中，權德輿〈嶺南節度使徐申墓志〉最爲顯著。不必說，這些唐代碑志銘詞並不依附於某種特殊樂調，但是，通過某種特殊的韻式，它們不僅完成了自身的文本結構，也爲文本建立了一種特殊的音樂形式。

⁵⁷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1，頁283。

最後，還必須注意到，唐代碑志銘文韻式大變，大致與中晚唐詞體之興起同時。在中晚唐以來形成的各種詞牌中，也有韻式較有複雜的，例如〈子夜歌〉屬於隨韻（aabb ccdd），〈紗窗恨〉首闕屬交韻（abab），〈壺天曉〉（〈西江月〉之一格）屬於抱韻（abba），〈荷葉杯〉（aabccb）是隨韻和抱韻相雜，〈定風波〉（aabba ccadda）和〈訴衷情〉（aaabccbbbbb）則是另一種隨韻與抱韻相雜。⁵⁸正如詞樂研究者所指出的，詞的押韻位置跟與其相配的音樂形式是密切相關的。⁵⁹詞學史上的這一現象激發了我的聯想：唐代碑志銘詞中所見諸種韻式，與詞體的韻式是否有聯繫？或者，再進一步推源溯流，唐代銘詞韻式之新變，與隋唐以來尤其是中唐以來民間所流行的各種音樂形式包括外來音樂是否有聯繫？個人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基本上是肯定的。實際上，無論是《詩經》、碑志銘詞還是詞體，無論在文本應用的現實還是在文學創作的傳統中，它們都具有音樂的背景與歌唱的屬性。而後代隨著詩歌的發展，尤其是在文人的詩歌創作中，詩的音樂背景和歌唱屬性越來越淡化，歌詩變成了徒詩，歌詩中那些配合音樂歌唱的多變韻式也漸漸淡出詩歌創作的舞臺中心，隱退到詩律史遙遠的背景中去了。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在中晚唐碑志文銘詞中出現多種多樣的韻式，而與之同時的中晚唐詩歌創作中並沒有相應地出現類似的現象。限於時間和篇幅，本文無法將這一討論展開，請俟諸異日。

⁵⁸ 參看王力，《漢語詩律學》（增訂本），頁 592-598。按：王力稱〈荷葉杯〉韻式「介於交韻和抱韻之間」，似不準確，亦與其在頁 932 中對「隨抱相雜」的界說自相矛盾。

⁵⁹ 參看施議對，《詞與音樂關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年），頁 194-217，尤其頁 213-217。

徵引文獻

(一) 古籍

-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79年。
-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 唐·梁肅著，胡大浚、張春雯整理校點，《梁肅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
-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四庫全書》影印文淵閣本。
- 宋·李昉等編，《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
- 宋·姚鉉編，《唐文粹》，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四庫全書》影印文淵閣本。
- 宋·趙明誠著，金文明校證，《金石錄校證》，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 宋·洪适，《隸釋》，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清·江永，《古韻標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四庫全書》影印文淵閣本。
-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 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
- 清·梁玉繩，《志銘廣例》，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叢書集成初編》本。

(二) 近人編輯、論著

王力，《詩經韻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王力，《漢語詩律學》（增訂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朱光潛，《詩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志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周敏，〈韓愈碑志的創革之功〉，《南京師範大學學報》期5，2000年，頁119-124。

施議對，《詞與音樂關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葉國良，《石學蠡探》，臺北：大安出版社，1989年。

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志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Martin, Kern. "Shi Jing Songs as Performance Texts: A Case Study of 'Chu Ci' (Thorny Caltrop)." *Early China*, 25 (2000): 49-111.